责编:龚克　E-mail:gongke@ccps.gov.cn　Tel:010—62806124　　2014年9月15日

专家视点

针对新的实际掌握基本理论

□沈宝祥

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并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开拓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1992年，在筹备党的十四大的时候，邓小平郑重提出，十四大报告讲成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邓小平强调集体智慧，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这既符合实际，也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但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历史，无论是从实践方面看，还是从理论方面看，邓小平都是主要的开拓者。我们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就是要认真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坚定不移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推向前进。

邓小平理论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创立的理论称之为邓小平理论，并阐明，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回答和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理论体系，是第二次飞跃的成果，也是第二次飞跃的标志。邓小平以后，我们党的理论继续发展，第二次飞跃在继续和深化，也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在继续和深化。

党的十八大把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以后创立的理论，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主干。从理论体系的角度看，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基本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我们所说的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和主要是学习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既重视理论创造，又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对此，他反复阐明，一再提醒全党。198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郑重提出：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要求党中央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他尖锐批评了轻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观念。

要着力学习和掌握基本理论

邓小平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个

>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结合当前实际，回答了党和国家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
>
>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是“新的实际”，一个是“基本理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作风的展开，富有新意。

历史从不停步，实践每天在继续，情况在不断发展变化，老问题也有新表现新状态，我们面临的总是新的实际。我们要重视了解和研究新情况，掌握新的实际。

理论是有层次的，有基本理论，也有非基本理论，我们要着力学习和掌握基本理论。当然，基本理论同非基本理论的区别是相对的。中央党校曾经编写了三本教材，分别是：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编写这些教材，目的就是为了使领导干部掌握基本理论。

学习和掌握基本理论，要着重于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回答和阐明的都是我们当前实践遇到的问题，是最管用的理论。这里，略举数例。

早在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就严肃指出：“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指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今天，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已经很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列举并剖析了我们现行的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的弊端，他尖锐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希望。”薄熙来、周永康问题的揭露，更值得我们深思。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对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这里，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如何建设好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的问题。

邓小平讲的这些理论观点，距今已有二三十年，但读来仍然有振聋发聩之感。面对今天新的实际，我们多么需要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这些重要观点啊！

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

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同样要注意完整地准确地理解。一是要把邓小平的某一观点联系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理解和运用，不要简单地到处搬用；二是要将邓小平的有关观点联系起来理解，不要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和运用。

比如，邓小平多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这当然很重要。但是，邓小平也不止一次地讲过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压倒一切”。

1985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又说：“总之，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再次指出：“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如果简单地将邓小平讲的两个“压倒一切”放在一起，就会发生哪个压倒哪个的问题。这就说明，我们对邓小平讲的两个“压倒一切”，需要联系当时的背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邓小平讲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压倒一切”，是在1985年和1987年初。那是在实现历史伟大转折以后不久，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启动的时候。这时，需要进一步肃清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牢固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位，需要大声疾呼经济体制改革，冲破“左”的阻力，为引起人们的注意，邓小平用了“压倒一切”的提法。这时，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社会矛盾，邓小平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在1987年3月8日接见外宾时指出：“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这年6月29日，邓小平又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这些，都是讲保持稳定局面的重要性，但他还没有用“稳定压倒一切”的提法。

到了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针对当时的形势发展状况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0年12月24日，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讲“稳定压倒一切”，是在1989年到1990年那一段，这时，中国的现实形势面临着如何保持稳定的问题。他用“稳定压倒一切”这样的语言来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总之，邓小平讲“压倒一切”，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压倒一切”，还是“稳定压倒一切”，都是针对特定的形势而言，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再如，关于如何看待争论的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干。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这里明确讲“不争论”。在另一些地方，邓小平又很强调争论的必要。1978年7月21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说：“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他多次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称之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邓小平讲“不争论”“争得好”，语言都很明确，语气都很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邓小平是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而言。对此，应当具体分析，全面理解。

又如，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发展民主，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决不能搞西方某些国家的“三权鼎立”体制，同时，他又强调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他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说：“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我们要将邓小平的这两方面论述联系起来理解和把握。如果只讲后一方面的观点而不讲前一方面的观点，那是片面的；同样，如果只讲前一方面的论述而不讲后一方面的论述，就更为片面。

要自觉地接受实践的检验

邓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的理论和路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已经写入了党的思想路线。我们应当自觉地拿起实践标准这个武器，经常检验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实践检验理论的过程。实践检验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但人们对此有没有自觉，其状况和结果就会大不相同。我们要记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长时期中，对实践检验缺乏自觉和勇气，错误的理论和路线不能及时纠正的深刻教训。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断地检验着我们的理论和路线（包括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决策）。检验的结果怎样？这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并作出判断的。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主要由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关于基本国情的论断，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论述，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等等，都已得到实践的证明，是指导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

第二种情况，有一些理论观点正在经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形成正确思想的认识阶段还没有完成。

第三种情况，实践已经证明，过去的有些认识不是正确思想。在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这是很自然的现象。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错误难免，但发现错误要及时纠正。

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的指导意义将是长期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结合当前实际，回答了党和国家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理论动态

以整体性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新世纪以来，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讨论，始于学术领域，扩展于整个理论界，波及意识形态建设领域。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这一命题，为什么能成为普遍讨论的热点？值得认真探究和思考。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研究的缘起

讨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是寻求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立足点和生长点的需要。中央实施“马工程”目的就在于从理论上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这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埋下了伏笔。在“马工程”推进前后，各高校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进行学科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一级学科，在一级学科下设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6个二级学科。由此，就需要回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即存在根据是什么；厘清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专业的边界。这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

讨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利益为轴心，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利益分层。利益主体多元化，决定了人们思想观念也呈现多样化的态势，这对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挑战。加之长期以来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僵化、教条甚至错误的理解，用割裂开了的、碎片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的经济社会现状，错误地得出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无用了的结论。因此，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党的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研究。

为了校正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肢解、曲解”，也需要呈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本真面貌。与实践中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问题相对应，在理论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割裂和肢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为深入把握一种理论的整体性，有必要对其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我们对其分门别类研究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三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之后，学科之间便各立门户、形成壁垒，各讲各的“马克思主义”。正如恩格斯晚年所言：“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带有肢解甚至误解的分门别类研究，割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其完整性，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旗帜的马克思主义，也被弄得像老和尚的百纳衫，支离破碎、互不联通，丧失了固有的整体性特质。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基本图景

从“论”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指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有其自身固有的逻辑起点、逻辑线索和逻辑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以此为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对人肉体组织、需要、生产劳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人的本质、人的存在和人的发展等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进而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成为科学。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整体性。以此为基础，他们注重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规律，意图是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三个方面对人的解放条件加以剖析；他们对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精神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宏大叙述，旨在从规律角度揭示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交互作用的图景；他们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和未来共产主义的设想，根本上是从社会制度演进角度，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终极关怀。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以研究人的存在、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为切入点，分析了人的解放的物质条件、主体条件与历史进程。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人与自然交往、人与社会交往、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揭示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人的发展的规律；在用一般规律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理想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始终如一的研究对象、理论逻辑和价值目标，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整体。

从“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具有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在狭义上，是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一个整体，既不能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对立起来，也不能把他们早期思想与晚年思想割裂开来。一些学者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恩格斯早在1886年就非常明确地说：“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段话清楚表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思想体系，两个人的思想相互补充，互为一体，不存在对立。马克思主义是对时代问题的科学回答，时代变化必然会出现新问题。因此，他们的思想在早期与晚期当然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表明两者的对立，恰好反映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体现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是走向“整体”的。从广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与他的继承者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总结苏东剧变教训之时，有人认为列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这是苏东剧变的原罪；在评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冲破马克思主义束缚的产物。这些看法都是与历史逻辑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不相符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如一是为人民大众立言，运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坚持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具体运用，体现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对立起来，特别是不能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整体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判断的学理基础，正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构、表现形式等方面看，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可以表现为多个方面。始终如一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时代问题，得出有利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思想观点，就体现了立场、方法、观点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还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统一；此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还体现为形成的整体性、主题的整体性、方法的整体性、发展的整体性、功能的整体性和叙述的整体性等。

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真实整体，由理论逻辑整体性和主题整体性等内在地统一起来。只有将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中抽出任何一个部分并与其他相割裂，都难以说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为我们反思以往理论上的某种失误和把握当代中国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

在理论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是产生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论原因。教条主义表现为：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整体中单独抽出一部分，并夸大其词强调其极端重要性。例如，先入为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切割成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等板块，把这些板块程式化、模式化、固定化，造成板块之间相互隔膜。其次，从板块中抽取部分，进一步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点，就肢解掉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变成了“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单兵突进；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就肢解掉了与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两大阶级利益极端冲突的前提，变成了“阶级斗争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并实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再次，再从部分内容中断章取义地抽出若干条条，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千古恒定的戒律。例如，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变成了反对资本的借口，把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分析变成了拒绝搞市场经济的理由，等等。在教条主义那里，马克思主义好像进入了屠宰场，先被分割成块，再被切割成条，最后风干成了干瘪无味的肉干。经过这一系列过程，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没有逻辑性、没有说服力、没有生命力的僵死教条。事实上，理论或实践中的“左”与右，无一例外地都与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有关。

在实践中，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形成了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这轮改革，是全面系统的整体性改革，目的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军队和国防建设各个领域的整体发展。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使改革力度、发展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程度相适应，也涉及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调整机制要相得益彰且发挥整体作用。到本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我们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包括器物现代化，而且包括制度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是整体现代化。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到了整体推进时期，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哪种学科和理论，都无法单独承担起这个重任，而整体性马克思主义，为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方法论。

（执笔人：牛先锋）